

## 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

特约撰稿人 绿茶

传统的中国年还没过完，看到103岁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过世的消息，让人悲伤。在此之前，杨苡先生的女儿赵衡老师第一时间赶赴南京，陪护重病中的妈妈。

虽然只能在病房中陪妈妈过年，赵衡老师还乐观地写了一条公号：“《总还有高兴的事》，大年初一当晚，央视《吾家吾国》杨苡专题播出。采访时间其实距离现在只有五个月。我有幸在拍摄现场，亲眼103岁的妈妈谈笑风生，和主持人王宇对应自如，回忆往事思路清晰，表达准确。屏幕上的妈妈双眸明亮，还是那么美，让人情不自禁会惊叹、折服。播出后我写下一段感想发给朋友们：今晚又见到神采奕奕的妈妈，对于守在南京为她病重担忧的我，百感交集！谢谢各位关注、厚爱，妈妈身上那种追求光明的生命力，永远鼓舞我们！”

几天后，永远乐观、美丽的杨苡先生还是走了。我们只能在“文画人”群里向赵衡老师表达哀悼。不久前，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出版，这两天一口气读完，对这位乐观、单纯的老太太又多了一层了解。

杨苡祖上是天津世家大族，祖辈好几位做了很

大的官员，祖父对做官倒兴趣不大。杨苡的父亲是家族的长子，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，但杨苡出生不久，父亲就过世了。关于杨家的故事，都是听母亲或家族其他长辈说的。杨苡的母亲不是正室，但她生了儿子杨宪益，是家族长孙，地位也随之提升了。母亲膝下最后活下来三个孩子，杨宪益、杨敏如、杨静如，小妹杨静如就是杨苡。

杨苡和姐姐都上了教会学校中西女中，读到巴金的《家》，杨苡深受触动，《家》中的情节写得像她们杨氏家族了。于是她特别崇拜巴金，疯狂地给巴金写信。后来收到巴金回信，并且巴金给她介绍了哥哥李尧林。李尧林当时燕京大学毕业正在南开中学执教。

李尧林和杨苡这对少男少女很聊得来，经常在一起聊天、散步，互相写信，那种很纯的友情在他们心中滋长。杨苡叫他“大李先生”，也一直把他当大哥哥一样。那时候，她崇拜的哥哥杨宪益去英国留学了，“大李先生”成为少女杨苡最重要的朋友。

时局动荡，杨苡随中国银行南迁到了昆明，并入读西南联大外文系。离开家，杨苡越发想念家人和“大李先生”，一直期盼着“大李先生”能来昆明。然而以当时的时局，通讯和行动并不能自如。

杨苡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艺青年，参加了很多联大的文学社团活动，在“高原文学社”活动上，杨苡认识了高她两届的赵瑞麒。赵瑞麒猛烈的追求，让单纯的杨苡招架不住，大二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了。后来又一起去重庆，杨苡再到中央大学补修学分，拿到西南联大的证书。

这本自传主要回忆了作为少女和青年高光时刻的岁月。尽管还有漫长的后半生，但对于杨苡先生来说，没有那么多时代赋予的苦大仇深，恩怨情仇，尽管我们都知道，历经中国近代百年，作为知识分子，所要面对和承受的苦难太多太深重，但那些过往回忆起来不免让人感伤、难过，即便都写出来了，也不见得可以出版。

所以，杨苡以她一向的乐观和单纯，回忆了自己最乐观和单纯的少女时代，交集过的那些人，既有师辈的沈从文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刘文典、陈梦家、吴宓等，也有同辈的杨宪益、巴金、李尧林、赵瑞麒、穆旦、马大任、巫宁坤、杨绛、萧珊、王树勋、金丽珠等，恰同学少年，那种情谊如今看来多么纯粹，多么真实。



著名翻译家杨苡。（资料图片）

还有经历过的那些事，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，中西女中的校园生活，和“大李先生”的懵懂情感，西南联大时期的启蒙，跑炮弹，结婚生子，以及重庆时期的家庭生活。这些经历看起来轻描淡写，实则都大风大浪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回忆录我们看过很多，很少有像杨苡先生这么乐观、轻描的。有离别，有无奈，有辛酸，有欢乐。在杨苡看来，“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，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”。

百岁的杨苡，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，更多兴趣在理书和翻看旧信物。一百年来，那些人，那些事，有说不完的话，回忆不完的岁月，这本书自然也不能尽其所思所想。岁月呼啸而过，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，她从不讳言死亡，也从不去盼望。她最喜欢引用《基督山恩仇记》里的结尾：“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：等候与盼望。”

## 一本本古籍命运被他改写

第三届“宋云彬古籍整理奖”颁奖，35岁的路伟荣获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·编辑奖，路伟从杭州奔来北京领奖，在中华书局颁奖现场，他亲耳聆听到颁奖词：路伟在古籍出版中挥洒汗水和青春，他以让古籍传下去为职志，通过不懈的努力，一本本古籍的命运被改写，获得了新生。

## 整理古书有探险乐趣

路伟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，他曾整理出版有《姚燮集》《沈复抄本琅嬛文集》《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》等。目前手头上正在编辑清代学者高士奇的全集，三四百万字的书，已打磨了数年。一部书花费数年对他而言早已平常，400多万字的《夏承焘日记全编》就是在历时12年的整理、编辑后终于付梓出版。

路伟说：“我近些年做清代文献比较多，进入清代文献世界，就像在原始森林探宝一样，有探险的乐趣，往往会有意料之外的新发现。”浙江古籍出版社重新校勘出版了最新版《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》。该书在市场上有十几个版本，但唯有路伟整理的版本《陶庵梦忆》利用十几个版本做了校勘，在中科院图书馆发现了现存诸多版本中唯一在刻本之前的抄本，因此格外引人注目。“我本不是张岱专家，只是机缘巧合，被张岱撞了一下腰，才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可以算张岱的一个异世知己吧。”路伟笑道。

新发现对于路伟而言，与刺激、挑战紧紧相连。路伟告诉记者，他编辑的《宋荦全集》出版过程中最令人惊喜的首推《嘉禾堂集》的发现。原来，宋荦《绵津山诗集》

卷二为《嘉禾堂稿》，收诗40首，后收入《西坡类稿》卷一，存诗35首。但路伟翻阅大量史料后找到蛛丝马迹，“据《西坡类稿》卷四十七《漫堂年谱》顺治十三年记载：‘余二十三岁，刻《嘉禾堂诗集》。’由此得知，《嘉禾堂诗集》曾经单独刊刻过。”他还查阅到刘樾《绵津山人集序》：“予初读先生《嘉禾堂集》二百卷，今则存四十卷，何其繁枝之多耶！”他因此推断，《嘉禾堂集》确实刊刻过，后来编入《绵津山诗集》时曾经大加删削，但具体删削了哪些内容，不得而知。

2017年初，在搜寻宋荦资料的时候，路伟竟然发现江西省图书馆有《嘉禾堂集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立即告诉了整理者刘万华，并鼓励他尽快赴南昌访书。2017年暑假，刘万华很顺利地看到了原书，花一周左右将此书整理了出来。此集不分卷，按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分排，共收诗367首。路伟认为，该集对于研究宋荦早期生平与文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，对于了解明清之交的文学生态也有不少参考价值。此集分体编排，且为海内外孤本，从未披露，最终纳入了《宋荦全集》，世人第一次知道了此集的面貌。

## 跑遍全国一半以上的省级图书馆

“有很多稿抄本还没整理出来，不为人所知，如果我们专业人士不尽责任，这本书就可能失传，后人就再也看不到了。”路伟被业内人称为“孤本杀手”，和很多编辑不同，他不是那种窝在办公室看稿的编辑，他爱跑图书馆，去过一半以上的省级图书馆。遇到孤本，路伟总是

有使之化身千百的冲动，“不管怎样，在人间留下副本，即便原先的珍本消失了，只要副本还在，文献就还能传下去。”他曾经在民间藏家中见到一种孤本，他用激将法说服藏家：“此书之存亡，系于您一念之间，您如果不拿出来，这本书可能就要失传，作者泉下有知，也可能怪罪于您。”

身为“孤本杀手”，路伟常常觉得如有神助。他这样解释这种神奇力量的来源：本来是大概率事件，你尝试得足够多了，就会变成大概率事件，很多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路伟尝试了四次，最终看到《陶庵梦忆》现存最早的抄本。

路伟在古籍出版上有一种理念：宁过而存，勿过而废。古人辛辛苦苦写书，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传下去，路伟也是要求自己少些分别心，尽量实现作者的意愿。“在寻找各种文献的时候，往往‘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’，我总在想，莫不是这些古人冥冥之中希望自己的书要出版，暗中相助吧。”

路伟和图书馆打交道，广结善缘，但他也发现有些图书馆的落后观念着实令他惊讶，“在有的图书馆看来，宝贝只能珍藏，出版后就不珍贵了。”路伟对这样的藏书理念打心眼里是不认同的，因为他认为书贵流传，流传中的书才能使其效应得到最大发挥。改变某些书的流传轨迹，对于路伟来说，这也是他从事古籍编辑的成就感所在，他依靠这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一路前行，从未放弃。

## 最高梦想是找到《红楼梦》八十回后迷失部分

路伟和古籍的缘分早在20多年前就有了渊源。



古籍整理青年奖·编辑奖获得者宋云彬。（资料图片）

路伟自幼喜欢读书，天文地理文学各种书都爱读，而和古文献相关的最早一本书是岳麓书社的白文本《史记》，那是他缠着父母以原价买的，当时他才上小学四年级。

路伟对古籍的真正热爱始于初中。那时，他经常跑旧书店旧书摊，为了买中华书局竖排繁体字版《资治通鉴》，他一元一角地攒钱，最终花50多元将那套书买下。但马叙伦的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线装本要200多元，最后他没有攒够这笔钱，只能与其失之交臂。路伟将遗憾化为行动，他从古文献专业毕业后，进入出版社，成为故纸堆里的淘金人，一干就是12年。“做古籍编辑要有耐心，需要有绣花针功夫，急不得，更躁不得。”路伟形容，就像拉扯孩子，从小到大，中间有很多人难以体察的痛苦。

异体字处理、校勘记写法、附录做法等，古籍整理需要专业训练，更需要

实操。路伟说，古籍编辑的功夫要求全面，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版本、目录、校勘的知识都要通晓，要保证编校质量就要获取各种版本，改字要有依据，写校勘记需要准确。他因此建立了强大的“数据库”，买了五六块硬盘，最大的容量有4个T。路伟说，自己干的活很苦，校勘上的通报要求将两个本子的不同文字都找出来，需要集中精力，丝毫不能走神，而他也练就了除了吃饭上厕所外，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“板凳功”。

“作为一个故纸堆中的淘金者，我的最高梦想是找到《红楼梦》八十回后迷失的部分，次一级的梦想便是找到《浮生六记》迷失的后二记。”路伟这样半开玩笑地说，他的目标是文献“续命”，使其获得新生，从而生生不息，不让后人再对着各种有目无书的文艺志发千古之幽思。

路艳霞

## 青藏高原上“幸运”的考古之花

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（下简称“双古所”）副研究员张晓凌的办公室，就被桌上摆着的一幅画吸引。乍一看以为是太湖水墨画，细看才发现其实是一块形状奇特石头的三个侧面素描。画面底部是一行漂亮的钢笔字：“尼阿底的万年石叶为高原腹地迄今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……”张晓凌说，这幅画是一位同事兼好友送的，为了纪念她登上高原十周年。

张晓凌曾经是个清瘦白净的小姑娘，芳华之际却毅然决然奔赴苦寒之地“找石头”，这一找就是12年。外人看来，其间应当有数不尽的辛苦与委屈，可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却反复提及一个关键词——“幸运”。

## “幸运”地发现尼阿底遗址

青藏高原上有种圣洁美丽的植物——高山雪莲，它们生长在雪线附近的岩缝、石壁和乱石滩上，因为天寒地冻、空气稀薄等极端恶劣条件，种子要经过数年积蓄力量，才能开花。

12年前，张晓凌跟着古生物科团队第一次登上高原，险些被“劝退”。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她每晚都头痛欲裂，无法入睡，“不行，明天我就要回去！”然而到了白天，巍峨高山，皑皑白雪，奔跑的藏羚羊、藏野驴、黄羊，悠闲踱步的牦牛，翩翩起舞的黑颈鹤，藏族孩子黧黑的脸上天真烂漫的笑容、茁壮的身姿……张晓凌在这片高寒土地上感受到了旺盛的生命力。一瞬间，头好像没那么疼了。在这里一定会找到古人类生活的痕迹，因为哪怕“绝域苍茫无所存”，生命坚韧的力量总可以扎根。

虽然信念执着，但是造化弄人。刚开始的三四年，张晓凌在高原兜兜转转，踏破铁鞋，却一直没能和古人类的踪迹相遇。她不断给自己打气：“走过了越来越多的河，转过了越来越多的山，爬了越来越多的洞，终究会有一些收获。”

终于，跋涉于莫莫高山、深谷逶迤多年之后，张晓凌实现了零的突破。他们发现了尼阿底遗址——青藏高原上首个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！这一发现填补了西藏旧石器时代史的空白，改写了人们对古人适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。2018年11月30日，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美国《科学》（Science）杂志在线发表，轰动国际考古界。2021年，张晓凌荣获第十三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。

高山雪莲生长速度虽然缓慢，一旦绽放，就是兼具药用价值与观赏价值的雪域奇葩、高山精灵；而张晓凌虽然数年蛰伏，终于在尼阿底遗址，把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进到4万年前，“能发现尼阿底遗址，我是幸运的。”张晓凌说。其实，这种“幸运”更是经过一番寒彻骨坚持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## “幸运”地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事业

青藏高原上，蓝紫色的龙胆花几乎随处可见。有诗曾赞叹它：“不卧龙官卧山林，一样青光若照人。”张晓凌就像龙胆花一样，不卧“龙宫”，而在高山砾石间绽放，在深山穷谷亭亭而独芳。

缘于对探索文献记载之外历史的兴趣，张晓凌在高考时选择了考古专业。入学第一课就是旧石器时代，她清楚记得，老师说99.99%的人类历史都属于旧石器时代。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发展进化让她着迷，四年本科课程未尽，于是研究生和博士阶段，她选择跟着双古所研究员高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。

2010年夏，中科院古生物科队从西藏归来，带回一些打制石器给高星。张晓凌无意间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了这批标本，神秘的雪域高原蓦地闯进了她的脑海。“古人类是何时进入高原，又是怎么适应这种极端环境的？”为了寻找答案，她走上高原，开始在风沙满天的苦寒之地追寻古人踪迹。

12年来，她和团队要经常驱车穿越高原无人区乃至野狼出没的地带，拖车、抛锚等“行路难”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；工地有时没水没电没信号，一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；在高原体能消耗极大，每一次去都至少要瘦10斤。

最近，张晓凌刚结束了持续5年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工作。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使得每年可以进行考古的时间只有2-5个月，而这宝贵的几个月也绝非风平浪静。

高原天气极其干燥，“疾风冲塞起，沙砾自飘扬”。在梅龙达普洞里，水浇在土上瞬间就消失了；手铲一挥就尘土弥漫，不用抽风机连人影都看不清。张晓凌和队友只能戴上耳塞、N95口罩、手套，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。其实在高原这种氧气含量很低的地方是不能佩戴N95口罩的，但现场没有人抱怨，大伙只是不时摘下口罩大口喘气又接着工作了。

这个洞穴的洞口距地面104米，相当于35层楼高。张晓凌和考古队员们每天都要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，扛着几十斤重

的设备和仪器，爬上35楼上班，下班再扛着标本和样品下35层楼。这种“负重爬楼”，日复一日，持续了15个月。

谈起这些苦，回到北京的张晓凌反而有一些怀念。虽然每次登上高原，她还是会有高原反应，头疼眼肿，如今血压还有些高，但她依然盼望着、热爱着登上高原。面对坎坷来路，为何张晓凌能以苦为乐？“因为我是幸运的，我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追求的事业。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，它就像我的第三个孩子，而热爱是可以排除万难，抵御万般艰苦的。”

## “幸运”地遇到一群温暖的人

在高原低温、干旱、强风的恶劣环境下，植株个体生存困难，有种“垫状植物”就会选择“抱团取暖”，像地毯一样紧密地“编织”在一起共同抵御寒风。张晓凌的家人、同事和藏民朋友，就像垫状植物紧紧围绕在她身边，为她在生命禁区搭建出温暖的一方天地。

张晓凌认为，在高原物质条件再艰苦、身体再不适，也比不上母亲和年幼儿女分离之苦。孩子还小时，出差几个月后张晓凌风尘仆仆赶回家，推开门，孩子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扑到她怀里，而是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盯着她很久。那一刻的心酸，刻骨铭心。“不过我是幸运的。”家人携手编织起一张温暖的网，让远在雪域的她没有了后顾之忧；爱人每天向她“汇报”家里的情况，但孩子生病之类的事绝对不会说，以免让远方的她牵挂、忧心；公婆没有埋怨过她，反而总对孩子说：“妈妈工作做得很出色，你们要向她学习”；父母更是用爱包容着她，从不会用工作稳定、顾家、收入高等来要求她。

女儿花生和儿子毛豆长大的每个暑假，也从未抱怨过妈妈缺席自己的每个暑假，而是觉得妈妈的工作“很酷”，很喜欢妈妈在野外给他们捡的藏地“特产”，比如藏原羚的角、鹰的羽毛、陨铁、漂亮的水晶或玛瑙等，都是向小伙伴们炫耀的“资本”。

张晓凌说：“我喜欢在高原工作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因为野外人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真挚和淳朴。”走出钢筋水泥建造的冰冷都市，在雪域高原的圣土上，在自然的山川湖泊间，人和人的心好像贴近了。有时工地缺水断电，伙食也要自己解决，考古队员就分工合作，懂电的负责发电，会做饭的就管起大家的一日三餐，“我一般负责洗碗。”张晓凌笑道，“大伙像一家人一样”。她还会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去拍阿里璀璨的星空，一起去牧民的帐篷里喝酸奶，一起穿着藏袍拍照，一起去逛赛马节。

考古工地上，也有许多当地的藏民帮着运土、搬石头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双方用微笑传递善意，用手势比画着沟通，慢慢建立起默契、信任和友谊。一次考古队意外被困在遗址和县城之间的路上，一位藏民得知，二话不说，骑马送来热水和泡面。在考古队员离开的那一天，队员们忙着收拾，一位藏民就一直在角落静静地等了一天，只为了亲手给每个人献上哈达和自己真挚的祝愿。

长相思，在藏地。每年结束在高原的考古工作后，远方的人和事，仍会拨动张晓凌的心弦。她挂念着青藏高原的天气有什么变化，野生动物有没有开始迁徙，闲暇还会和孩子一起看西藏野生动物、风土人情的纪录片。“老家河北是我的第一故乡，北京是第二故乡，青藏高原就是我的第三个故乡。”高原故乡的亲人们也挂念着她，每逢当地下雪了或过节，她都会收到牧民朋友的照片，寄托着“故人何不返”的思念。

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数千年的祈盼？关于青藏高原的人类历史，还有很多未解之谜。待青藏高原上的树林再次变绿、花儿再次绽放，张晓凌和伙伴们又将回到高原，凭借着各种“幸运”，一起探寻解谜的新密码。

李韵 王笑妃



考古学者张晓凌。（资料图片）